

心·学·政

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

陆永胜 著



阳明学研究丛书

赵平略 陆永胜

主编

中华书局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阳明学研究丛书

赵平略 陆永胜 主编

心·学·政

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

陆永胜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陆永胜著. —北京:
中华书局,2016.9
(阳明学研究丛书/赵平略,陆永胜主编)
ISBN 978-7-101-12030-1

I.心… II.陆… III.王守仁(1472~1528)—哲学思想—研究
IV.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3657号

书 名 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
著 者 陆永胜
丛 书 名 阳明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赵平略 陆永胜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40×1260毫米 1/32
印张16 $\frac{3}{8}$ 插页2 字数422千字
印 数 1-18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030-1
定 价 58.00元

总 序

《阳明学研究丛书》是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着力打造的学术品牌之一。在本套丛书新的著作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之际,我们想对出版这套丛书的动因及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方家。

进入 21 世纪,中国阳明学研究之炽热程度可能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进入新世纪仅十余年间,阳明学研究的一些特征和趋向已初露端倪:

第一,广泛的参与面。目前参与阳明学研究热潮的有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和民间,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个层面主体对阳明学的具体诉求是有所差异的。政界、军界、商界的诉求以“致用”为主,民间的诉求以“通俗化的道德建设”为主,学界在整体上坚守了“文化继承与学术理论建设”的方向,但同时又成为其余四个层面的诉求实现的途径,故表面上最繁荣,内在最紧张。

第二,宏大叙事背景下的微观研究。在时代政治、主流价值的言说语境中,阳明学研究以其自身的发展参与了“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等时代文化叙事体系。但阳明学研究受自身的理论特征、文化角色、研究传统、文献资源、研究程度等的限制又呈现出专门化、精细化的特点。

第三,国际化与区域化的统一。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阳明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加强,不仅东亚阳明学这一传统研究板块持续保持了研究热度,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而且欧美学者对阳明学研究也日趋深入和专题化,而非如20世纪的大多数著作将阳明学仅作为儒学或宋明理学的一部分作某一向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当代阳明学研究的国际化超越了国家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更普遍、更深层的意义上体现出文化本应有的价值属性。阳明学研究的区域化主要指阳明文化区域建构,这是一个比地方学术流派研究更具区域意识的研究范式。“文化区域建构”以区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学术流派或人物,综合区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因素,在一个多因素共生的“生态系统”中考察文化的发展、衍化及其独特性,并进而思考它对区域形上思想世界和形下实践世界的影响。文化区域建构研究往往可以在客观上为区域文化保护和开发、区域意识形态安全、区域人文精神塑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新的思考维度。虽然文化区域建构的明确意识使研究材料和对象具有相对封闭性,但并不妨碍在研究方法、研究视界等方面的国际化。地方的亦是世界的,二者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主编了这套丛书,并对这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如下的版块划分和设想:一是阳明学思想义理的研究,在主题与选材上打破时空限制,兼及中国阳明学与海外阳明学研究,力求国际化视野;二是黔中王学的区域化研究,对明清贵州阳明文化作“文化区域”意识的思考,并对之进行精细化的微观研究,在多维度的视阈中尽可能地充分、深入挖掘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源;三是阳明文化的通俗读本,普及阳明文化,服务社会文化需求;四是阳明学研究文集,从更多的视角反映阳明学的研究与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在阳明学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开创新的局面,并担负起文化传承与学术理论建设的学术责任,同时也是对主流思潮和学术主流的回应。

我们相信,读者可以通过本套丛书体会到各位作者的辛勤劳动及对学术的严肃思考和敬畏;我们也相信,读者会发现本套丛书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阳明学研究的思想启迪和价值意义。这就是我们出版本套丛书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是美好而宏大的,然而力量有限,希望广大读者能够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体谅我们的不足,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陆永胜 赵平略
2016年仲夏于贵阳

序

在国学成为当今学术热点的宏大背景下，儒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热点中的焦点；在儒学被人们疯狂追捧、万宠集身的情境下，阳明学则成为人们关注最多的学说之一；而在热火朝天的阳明学研究中，黔中王学不经意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与照顾——仅在贵州省，与黔中王学密切关联的阳明学研究团体纷纷成立，阳明学研究期刊竞相登场，阳明学研究论文雪花飞舞，阳明学学术会议此起彼伏……正是在这种繁荣昌盛、锣鼓喧天的氛围中，陆君永胜负笈金陵，亲临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永胜念硕士时所修专业是文艺美学，因而字里行间透着浪漫与美感；后又供职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且先后申报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黔中王学外王化研究”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阳明美学思想研究”，这样的经历，让他对阳明学与黔中王学有了厚实的积淀。而我向来要求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最好与自己的研究基础、学术兴趣、工作环境相结合，尤其强调选择那种在未来可以拓展自己学术空间的题目。所以，当永胜告知我准备以“黔中王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因为完全符合上述“苛刻”要求，我根本没有任何迟疑便默许了。永胜在原有坚实的研究基础上，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与写作，洋洋洒洒

3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读者朋友读到此书当然会有自己的高明判断。而我作为一名读者,读罢此书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正好永胜命我为此书写序,我就趁机将我的感受写在这里,期与读者朋友分享。

—

人所共知,哲学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文献资料,再好的头脑也做不成文章,自然更不用说做漂亮的文章。但此书不仅在文献的整理上花费了巨大功夫,而且在文献的辨别与解读上也是得心应手。我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如下切身感受:

一是努力于各种文献的梳理与把握(参看前言之“研究现状与启示”)。纵观全书,其文献涉及范围极为广博,从记载黔中王学者学行的个人志书(如明代郭子章的《黔记》、清代田雯的《黔书》)到前人编著的记载了明清黔中王门弟子的诗文集(如《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从明清正史到地方志(如《贵阳府志》《修文县志》《都匀府志》《思南府志》《思南府续志》等),从黔中王学思想家的个人著述到后人点校编撰的黔中王门学者文集等,无不搜罗其中。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本书对黔中王学已有研究成果也是了然于心,如认为以往的黔中王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方法与经验,但都是以个人为单元模块进行整理,缺乏整体和内在联系研究;又如认为以往的黔中王学研究成果中有的偏于考据考证,有的则偏于义理思辨;从而明确了自己学术工作方向与研究任务。

二是精于文献的考证与甄别。由于黔中王学文献广博而混杂,文献的真伪、归属与价值等,都需要严谨的考证与甄别。可以说,作者在这方面也是一丝不苟。比如,本书通过对明代贵州书院的考证与甄别(参看第一章第一节),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了缺失的文献,从而使明代贵州书院的真实状况得以全面呈现。再如,本书从版本、文字、行文顺序和标题等方面对《镇远旅邸书札》进行了详细考证

(参看第二章第一节),从而将此文献的组成部分及其顺序(《与龙冈书院诸生》《与李惟善书(一)》《与李惟善书(二)》)确定下来,这为研究黔中王学的学派构成、分布及思想传承提供了极大便利。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白下”(出自李渭自述:“吾于此学,入白下时,觉与官和州时不同;登天台时又觉与白下时不同;与近溪游月岩,又觉与以前不同也。”)的考证(参看第三章第二节)。针对学界的不同意见,作者根据耿定向之语:“道林先生破其拘挛,余伯兄谓之有耻,仲兄直指本心,近溪先生喝其起灭,卒契毋意之宗”,做了四点详细的分析与考证:其一,李渭自叙及焦竑、耿定向转述为学之变时,均无提及与湛甘泉的交往,说明与甘泉的交往对其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其二,从三人表述看,“白下”是李渭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理应有触发其思想的标志性事件,而只有耿定向“谓之有耻”,显然重于对甘泉的拜访;其三,从时间上看,焦竑言“白下”与“与居和、高时不同”,即是说“白下”问学耿定向在居和、高之后;其四,从事件发生的要素看,“白下”自唐代贞观后即是南京的别名,“白下见耿师”发生在李渭去职高州同知之后是比较可能的。因而本书推断“白下”是指拜访耿定向,而非湛甘泉。

三是工于文献的研读与合理引用。文献的发掘整理需要扎实的国学功底,而文献的合理引用则需要较强的学术能力。本书在这方面也有出彩的表现。比如,在文献的布局与搭配上(参看本书目录),本书分别按修文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等五大重镇进行,将与各重镇相关的王学文献恰到好处地加以安排。而对黔中王学各重镇代表人物的文献安排、应用也是周全得体,比如:修文王学蒋信,主要讨论他的心学与心政;思南王学李渭,主要讨论他的仁体与先行;清平王学孙应鳌,主要讨论他的治心与治世;都匀王学邹元标,主要讨论他的振世觉民。无疑,作者的这种安排都是与其仔细研读文献、熟悉把握内容分不开的。另外,本书对于阳明悟道期间的文献也有谨慎的考证和整理(参看第一章第二节):文章 31 篇、诗歌 112 首、曲词 5 阙、楹联 2 幅,而在 31 篇文章中,记 8 篇、序 6 篇、

书信7篇、祭文和墓志铭5篇、论说5篇,这些文献足以说明阳明心学思想已经成长,从而为阳明心学之于明代贵州思想界的影响并形成黔中王学提供了证据。

我们说,正是由于在文献整理、辨别与研读上的杰出工作,作者才能写出如此严谨的作品,才能将黔中王学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才能揭示黔中王学的特点。因此,由于文献资料功夫的到位,作者不仅做出了文章,而且做出了精彩的文章。

二

成功学术论文或著作的标志之一,就是它理论架构的完整性、严密性和清晰性。近日我跟一朋友闲聊,感叹现在写一本书颇觉不易。我想这里的不易,其中就有框架搭建的问题。一部优秀的著作要求框架齐整、线条清晰、环环相扣,还要气势恢宏。然而可喜的是,永胜这部著作大体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从全局观之,它是以黔中王学的“实学”特质为主轴,以“心”“学”“政”三个论域为内容,以黔中王学五大重镇为格局,对黔中王学进行了宏大的叙述、缜密的分析和谨慎的评述。而且,文首安排了前言与第一章对本书的研究做综合的引导性论述,文后有结语对全书进行总结提升。可谓视域宏阔,高屋建瓴,一气呵成,非常成功地将读者诱入黔中王学的思想世界。

当然,本书框架的严谨与恢宏,绝不仅表现在这样一个整体框架上,也表现在每个章节的严整、紧凑、细腻与贯通上。比如对黔中王学五大重镇的介绍,都是分为王学士人群(或该地区王学的形成)和代表人物的王学思想研究两个部分。具体言之,如修文/贵阳是王学士人群及其思想介绍和蒋信的王学思想研究;思南是王学的形成与讲学活动的介绍和李渭的心学思想研究;清平是王学的形成及其思想介绍和孙应鳌的心学思想研究;都匀是王学的形成介绍和邹元标的心学思想研究。

而且,对黔中王学思想内容的介绍与分析,往往与王阳明心学

思想结合起来,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分析李渭的“毋意”思想,就与王阳明关于“意”的思想结合起来讨论。这样就使得每个章节的讨论内容平直而不扭曲、富厚而不紊乱、鲜活而不呆板,从而成功地让读者领略到黔中王学的万种风情。

尤其令人难忘并值得肯定的是,其对每位心学家思想的介绍与研究,无不以“心”“学”“政”为主轴并一以贯之。比如,对蒋信王学思想的研究,即从心为气本的本体论(心)、逆觉体证的修养功夫论(学)、以政为中心的实践论(政)三个方面加以展开;对孙应鳌心学的研究,即分别从“仁”质《易》文的心体建构(心)、实有诸己的功夫修养论(学)、以“心”为内核的治理论(政)三方面展开论述。而且,其具体的论述也是波谲云诡,或者惊涛骇浪,或者波澜不惊,或者春意盎然,或者秋杀冬藏,黔中王学的生命情状被描述得栩栩如生。从而成功地让读者的精神生命与黔中王学的精神生命相与呼应。综合言之,内在地看,本书从“心”本体到“学”功夫,再到“政”外王,从形上到形下,同时对相关命题、概念做细致的分析和客观的评论,使本书的神、形融为一体;外在地看,本书章节工整清晰,由大而小,由小而微,上下相连,左右贯通;从而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结构明朗、风情独到的黔中王学精神图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构并非作者异想天开,而是基于这样的深厚思想背景:儒学以“心”为本,孔子言“仁”,孟子言“良知良能”,朱熹言“心统性情”,象山言“本心”,王阳明言“心外无物”,等等,因而“心”是儒学之本;儒学注重修养,孔子言“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言“吾养我浩然之气”,周敦颐言“无欲主静”,朱熹言“主敬”,象山言“发明本心”,王阳明言“致良知”,等等,因而功夫是儒学的看家本领;儒学热衷政治,孔子言“为政以德”,孟子言“仁政”,荀子言“隆礼重法”,董仲舒言“独尊儒术”,张载言“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言“理一分殊”,王阳明言“破心中贼”,等等,因而谋政是儒学的理想追求。如此说来,“心”“学”“政”当然是儒学的基本论域,因而本书以“心”“学”“政”统领黔中王学,是与儒学这门学问的底色完全相符的。

而本书所呈现的严整、完美的理论架构,不仅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材料的能力,也显示了作者理解文本的悟性;不仅显示了作者设计学术大厦的技巧,也显示了作者较扎实的儒学功底。

三

学术研究需要的态度是言之有物、严谨认真,而不是无病呻吟、浅尝辄止,对问题的思考、分析与判断必需周全、深入。当今学术著作的问世令人眼花缭乱,但却少见厚重的、高水平的著作,其原因之一,就是急功近利、走马观花式的研究,一个问题尚未搞清楚,便移情别恋到另一个问题了,造成的学术垃圾堆积如山。我们欣喜地看到,本书克服了这个毛病,而其研究品质上表现出的严谨、细致和深入是值得称道的。这里我罗列数个案例与读者朋友分享:

《五经臆说》中王阳明究竟说了什么(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学界先后出现过各种讨论与判断。但本书认为,王阳明对于“五经”的训释就是以通经来明道。所谓通经,就是阳明以自悟之心学思想诠释五经;所谓明道,即是以五经为理据论证其心学之悟。因而对阳明而言,“五经”即是其心学思想的承载者,故通经具有切实的意义。不唯如此,作者还分析了阳明对“元”“贞”等范畴的解释,比如认为王阳明关于“元”的理解具有如下哲学意义:一是“元”作为具有本源意义的“始”,体现了“心”的先验性;二是“元”作为天之四德“元亨利贞”的“始”,具有包含四德的意义;三是训“元”为“始”,训“元年”为“正始”,即是“正君心”,其中已经蕴含着“知行合一”的萌芽;等等。可以说,这些分析都是发人之未发,是难能可贵的。

黔中王学与当时周围学说是怎样的关系(参看第一章第二节)?针对某些学者所坚持“黔中王学只是单一传承王阳明思想而发生”的错误观念,本书通过缜密的考证与深入的分析,指出黔中王学思想不仅仅是王阳明在黔时的思想,而且是融合了甘泉学、程朱理学的综合体。举例言之,黔中王学虽然萌发于明初贵州的理学氛围中,但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气”的思想,而且更注重践履功夫,体现

出鲜明的实学色彩,从而演绎出由“理”到“心”到“气”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在学术形态上,则表现为承继理学、创立心学到开启朴学的形态转变,而这正说明黔中王学刻上了深深的明代学术发展的烙印。这种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黔中王学的“为政”实践有没有学说基础(参看结语之“重行致用”)?如果有,是怎样的基础?可以说,黔中王学继承了儒家“好政治”的传统,不仅“好言政治”,而且“好行政治”。那么,黔中王学“为政”的学说基础是什么呢?本书认为,黔中王学的为学、为政在客观上虽然得以统一,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两件事:黔中王学是以心(道)为政,以心(道)讲学,而不是为政(国家化)讲学,只有在为心(道)的价值层面,为学和为政才达到了真正的内在统一。并指出,如果黔中王学是为政(国家化)讲学,那么阳明龙场悟道及心学兴起的思想史意义将难以凸显,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真正体悟由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到邹元标的“振世觉民”的思想脉络的一致性和启蒙意义。这个论说虽然是可以讨论的,但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精细、深沉的思考风范。

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渭(参看第三章二节),其心学成长于怎样的环境?又有怎样的特点?这也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李渭的心学经历过五次变化,但对其原因莫衷一是。本书通过全面、细致、深入的分析后指出,由于李渭心学思想的形成正处于理学的回归与心学的反思这两种极端思潮的夹缝中,所以其心学思想才会发生“五变”现象;不过,李渭也因此代表黔中王学承担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既要反对理学之僵化呆滞,又要反对王学末流的空疏玄虚,从而走上融合会通之路。这个思考再次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品质和深化问题的能力。

如上数例足以说明,本书对待所有的学术问题都秉持认真、严谨的态度,问题无论大小、深浅,本书作者都能耐心、细致、深入地展开分析,谨慎地进行考辨,平实地展开研讨,客观地作出判断,不浮躁,不功利,不马虎,这在当今学术泡沫化的时代,殊为难得一见而

卓尔不群。

四

学术著作最能体现其价值的,除去人文关怀之外,就是学术上的创新。能否提供新的文献,能否开辟新的视角,能否提出新的观点,是验证学术著作是否创新的三要素。本序前面的论述对于文献上的创新、视角上的创新都有所涉及,因而这里专门考察并欣赏其观点上的创新。

虽然黔中王学的文献都已整理并甄别完毕,但如何展开对黔中王学的研究却是另一件颇费心神的事。本书尝试性地提出了研究黔中王学三个论域的想法(参看前言之“研究现状与启示”),即以“心”“学”“政”作为考察、研究、评判黔中王学的主要论域,并以三者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基于此,本书实际上就是以“心”“学”“政”贯通黔中王学各支派,并由此进一步探讨黔中王学的内容与特点。这种确定研究论域的学术实践,在以往的黔中王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黔中王学研究的新领域,开辟了黔中王学研究的新方向。

黔中王学究竟以怎样的结构形态呈现(参看前言之结论部分)?这是在过去黔中王学研究中几无提及的问题。本书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成功地展开了有价值的探讨。本书认为,由时代语境、地域语境与个体学行相结合,依历时顺序呈地域分布的动态思想传承,其在整体上表现为黔中王学五大重镇的形成、发展和学派、个体思想的传承与理论的具体展开,此即所谓的显性结构;而黔中王学诸儒在求同存异原则下建构起来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学派思想体系,是为共时的整体静态呈现,具体为“心学合一”“心政合一”“学政合一”三个向度,但此三个向度在观念逻辑上具有相互独立性,而在具体实践形态中具有相互交融性,此即所谓隐形结构。如此关于黔中王学结构的判断,不能不说是独辟蹊径、令人叫绝。而关于黔中王学的性质,本书所陈述的观点可谓朴实而惊艳(参看结语之“实学实

用”)。本书认为,黔中王学是阳明学最早、最重要、得阳明心学最醇正且后学几无背离的学派,它不仅忠实践履着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而且体现了明代中原儒家文化的大传统对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域的贵州民间夷文化小传统的渗透、影响、改造,并主导人间秩序构建的文化格局演变过程,其学术形态上表现为由理学到心学再到朴学的转变,并由“心学”“心政”“学政”的理论形态和“修身”“为学”“为政”等实践形态具体落实,因而黔中王学最终导向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诉求,而其最根本性质就是“外王化”的实学。这个结论与通常的说法相比,更具理论厚度,更具独特品质,更具学术诱惑。

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蒋信,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特点不置可否(参看第二章二节)。本书经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判断:蒋信思想具有承继心学实学和开启气学实学的重要过渡作用。即蒋信所坚持的是心本论立场,而对“气”的强调正体现了明末清初学术的逐步转向,黔中王学以其自身的特质在整体上参与了这一学术潮流,蒋信是继阳明心学实学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弟子之一。这个研究结论纠正了那种视蒋信哲学思想为气本论的片面观点。由此也可体会到本书作者在学术上的自信与独立精神。

黔中王学思想形成的语境有怎样的特点(参看前言之结论部分)?这也是黔中王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本书在这方面的探讨也是令人耳目一新。本书指出,黔中王学形成、发展、式微于双重语境:一为时代共性语境,即黔中王学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中晚明朱氏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时局的颓废与学风、民风、吏风的流弊日甚一日;二为地域个性语境,即明代中期的贵州建省不久,正处于国家化和内地化的转型期,士人以大一统为价值诉求积极建构边地知识体系和社会秩序,形成了以阳明学为内核的黔中儒学思想世界。正是这两种语境的交融互动所形成的“典型环境”,赋予黔中王学以时代共性和地域个性,成就了黔中王学这一“典型学派”。也许,黔中王学的研究者们可从这个探讨中获得某些能够引发思考的重要学术信息。

如上数例足以显示本书的创新勇气与创新成果,正是这些以及尚未罗列的诸多创新,成为本书熠熠生辉的亮点;正是本书在文献发掘、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创新欲望和勇气,使本书成为一部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成果。

五

本书的学术成就已经让我兴奋不已,更让我兴奋的是,本书的论述常常能引发我们的思考与遐想。

其一,黔中王学虽然与王阳明心学思想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认为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但必须注意的是,王阳明停留在贵阳的所有时间加起来只有两年(“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见《与辰中诸生》,《王阳明全集》卷四《文录一》),这就需要在讨论阳明心学之于黔中王学影响时,应该关注影响的范围与程度。而且,王阳明离开贵阳之后,其心学思想无疑更加完善成熟,并有所变化,那么,如果说王阳明离开贵州之后,其心学思想仍然影响着黔中王学,其影响的方式是什么?其影响程度又如何?等等。本书虽然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与回应,但似乎仍有深化的空间。换言之,我们研究黔中王学需要关注客观条件所带来的主观差异,不能以理论的抽象性抹杀问题的历史性与具体性。或许,这样做可以更加清晰地、深刻地呈现出由原始的阳明心学至黔中王学的发展演变之脉络。

其二,黔中王学能否确定为最醇正的心学?这种判断隐隐地促使我们思考:阳明心学最醇正的标准是什么?难道阳明本人的心学还不够醇正么?阳明后学的其他学派诸如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也都不够醇正么?黔中王学因为黄宗羲的疏忽或偏见而没有荣幸地现身《明儒学案》而颇感委屈,但或许正因为这点,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黔中王学与阳明心学的实质性关系。也许由于本书的问世,黔中王学便可以光明正大而理直气壮地在阳明心学的谱系中“合法地”占有一席之

地了。

其三，本书提到黔中王学的“心”“学”“政”是为三。这种提法启发我们回忆阳明心学的特质。因为我们熟知王阳明心学最大特点就是“一”，他认为“心”“理”“良知”“性”为“一”，他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一”，他认为“知行合一”，他认为“万物一体”，就是说，王阳明心学理论的特质如果用一个字去概括，那也可以说是“一”。而按照本书的论述，黔中王学的“心”“学”“政”是各自独立的三个领域，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要重新思考“心”“学”“政”三者的关系，还要重新思考黔中王学理论特质与阳明心学特质之关系：黔中王学是阳明心学的传承而光大弘扬？还是歧出而别子为宗？本书的相关讨论在这方面给予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最后一个问题并非只是本书所引发，而是当今国学学术研究中的普遍格调所引发，即在当今歌舞升平的学术氛围中，研究者们对于儒学或阳明学或黔中王学的研究，其格调都是一味地正面陈述、积极性解释，肯定的词汇、表扬的叙述几乎宠坏了我们的感官。对于国学、儒学、阳明学乃至黔中王学的研究，我们当然需要有客观、正面的思考与评价，也需要“正能量”的阐述，但任何学说都是时空的产物，都是历史的，都有它的限制，因而研究主体有意无意地忽略被研究对象的消极部分，不仅是有悖于学术规律，而且是疏于自己的责任。因而我希望以后的黔中王学研究中，能有检讨、反省的部分，此亦是黔中王学更新、丰富、发展所需要。

概言之，本书的成就并不仅仅在于它完整而出彩地将黔中王学多姿多彩的风貌展示在读者面前，而且还在于其展示多姿多彩风貌的技术动作引发了我们的丰富遐想。这种遐想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些并不夸张的评价：它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明代贵州的哲学思想加以整理和描述，这无疑是对贵州省文化思想史的重大学术贡献；它是第一次对黔中王学做全面、系统和深入的介绍与研究，这无疑是对阳明后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贡献；它是第一次对黔中王学思想内容、结构和特质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无疑是对黔中王学研究